

普及阅读应警惕“伪阅读”

何亦聪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电影产业崛起,印刷文化遭受视觉文化的冲击,一些知识分子曾经设想过阅读的消失;视觉艺术会不会最终取代书籍成为滋养人类精神的唯一食粮?这种设想造成了一些悲观的论调:有人认为世界将进入“图像时代”,文字会日趋边缘并成为彻头彻尾的工具;有人认为当代文化将由语言中心走向视觉中心,最终变成一种纯粹的视觉文化;有人则断定人类已经到了“阅读史上最糟糕的时刻”,我们必须倾尽力量才能守护文字阅读的传统。而近十年,随着数字媒介尤其是短视频的发达,这种论调再次被推上潮头,拣取相关议论,我们几乎很容易产生这样一种感觉:自20世纪以来,文字阅读危机愈益深重,难以解除。

事实果真如此吗?倘若联系相关的阅读调查数据,就会发现也不尽然。根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成果,拿2024年的调查数据与2006年的“第四次全国国民阅读

调查”对比,可以发现中国成年国民的综合阅读率增长了12%以上——这可能与高等教育的普及、识字率的提升有关;数字阅读逐年攀升,从2013年至2024年,增长了近37%;纸书阅读基本是持平状态,2013年人均4.77本,2024年人均4.79本;而2024年的人均报纸阅读量,尚不及2015年的四分之一,不过,统计数据并未将数字报刊的阅读情况计算在内。综合以上信息可以看出,文字阅读并没有因短视频、网络游戏的冲击而陷入危机,反而因数字阅读的普及而有所发展,所谓“危机”更像是舆论界惯用的修辞术。当然,更重要的是,需要阅读或喜爱阅读的人,总会翻开书本,无论从实用还是趣味角度看,阅读始终是无可替代的。

既然阅读率或阅读量不是问题,那么,当下推广全民阅读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我认为是阅读的质量——不是所读书籍或文字的质量,而是阅读行为本身的质量。在影响阅读质量的种种问题中,最严重且难以辨别的,就是“伪阅读”。伪阅读不是伪装的阅读或表演性阅读,也不同于我们通常所批评的功利化阅读或碎片化阅读,而是一种貌似严肃的、失去了开放性的、向外攫取信息又最终回向自我的阅读,这种阅读的唯一功用,不过是为阅读者原有的思想、见识、立场镶上一层漂亮的知识花边。如果说数字媒介造成了阅读的危机,那么,其危机也正在此处,搜索引擎的强大便利、信息获取的简易直接滋生出一种“万物为我所用”的骄横,这种骄横使得人们在空前丰富的知识面前反而变得越来越封闭保守。

100年前,受限于识字率、教育水平和经济条件,阅读只

是少数人的事情,今天中国15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已达到97.6%,绝大多数人都至少可通过手机阅读公众号文章或浏览新闻资讯,因此,仅就文字阅读的普及性而言,我们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可以说,直到近20年,阅读才真正成为多数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随着阅读率的攀升,我的忧虑在于,阅读也许并不能对多数人发生实质的作用,而仅仅是造成了信息量的堆积,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高估了阅读所能给予人的助益。

比如,许多读者并没有因为大量地阅读小说而对他人的生活方式、道德选择或精神困境更具理解力与同情心,只需稍稍注意“微信读书”里某些小说的片段标注及评论,我们就能发现伴随阅读而来的往往既非好奇心,也不是情感共鸣,而是傲慢、苛刻与道德优越感。许多学者并没有因为阅读专业书籍而打开视野、持续思考,他们往往只是习得一些特定的概念、话术或学术写作的技艺,由此陷入文字或理论的空转而不自知。当然,更重要的是,阅读似乎也没有让人们就某些基本问题形成共识或常识,许多人的阅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就像一个漩涡,信息积累再多,最终也不过是落入一片虚无的空洞。

这就是“伪阅读”,与之相对的,当然是“真阅读”。我所说的真阅读,不是人们常说的慢阅读、深阅读或兴趣阅读,而是一种真诚且谦卑的,为好奇心、同情心或求知欲所驱使的阅读,其目的不是在获取信息的过程中印证自己的正确或优越,而是努力发现这个世界的广阔、复杂与多元,不断突破,不断提升。

双塔

太原日报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大家十分熟悉的五言绝句《江雪》是柳宗元的代表作之一,其意境高远、清静、孤傲,描景与抒情融为一体,表达了诗人超然物外的境界与冰清玉洁的品格。

柳宗元有着辉煌的家族历史。他祖籍河东,也就是山西运城。他出身显贵,先祖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官员,到北朝时,柳氏是著名的门阀士族,与薛姓、裴姓并称“河东三著姓”,也就是河东地区最大的三个家族。从南北朝时期一直到隋唐之际,柳宗元的祖先们不是大将军就是大都督,最不济也是个刺史。在唐代初期,柳宗元有两位四世祖比较厉害,一位是唐高祖李渊的外孙女婿。另一位是唐高宗李治时王皇后的舅舅。名门望族的出身让柳宗元一出生就含着金钥匙。再加上柳宗元少有大志,聪敏过人,才华卓著,21岁考中进士,26岁通过博学宏词科考试,33岁担任礼部员外郎,可谓年少成名,春风得意,仕途顺畅。

但是,人生不会总是一路坦途。因参与永贞革新,柳宗元被贬到邵州(今湖南邵阳),接着又被贬到永州(今湖南永州)担任司马。柳宗元三十二三岁被贬之后,除了唐元和十年(815)一度短暂回到长安之外,后半辈子再未能回到朝中做官,他在被贬的永州和柳州度过了残生,去世时年仅47岁。

《江雪》大约作于他谪居永州期间。柳宗元被贬到永州之后,精神压抑,于是,他借描写山水景物,借歌咏隐居在山水之间的渔翁,来寄托自己清高而孤傲的情感,抒发自己失意的苦恼。因此,柳宗元的山水诗有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把客观境界写得比较幽僻,以此来衬托心情的寂寞,甚至是孤独、冷清,让人难以感受到人间烟火气。

飘着大雪的江面上,一叶小舟,一位老渔翁,独自在寒冷的江心垂钓。天地之间是如此纯洁和寂静,一尘不染,万籁无声。“千山”“万径”作为渔翁的出场背景是那样的浩瀚寥廓,无边无际,迷茫苍郁。一个“绝”、一个“灭”,进一步让背景变得寂静、沉默。而紧接着出现“孤舟”“独钓”,让人陷入更加荒凉的境地。渔翁似乎被遗弃了,遗弃在冰冷的江面、雪原之上。在这样一个寒冷寂静的环境里,老渔翁不怕天冷,不怕雪大,忘掉了一切,专心钓鱼,形体虽然孤单,性格却清高孤傲,似乎有点凛然不可侵犯的模样。显然,诗人是借渔翁表达清高孤傲、超然物外的思想感情。

柳宗元在永州谪居的头五年,借住的破庙发生过4次火灾,每次都是死里逃生。湿热的瘴气让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读书的精力和记忆力也在减退。他也希望自己能够被重新起用,回到朝廷,但是希望渺茫。生活环境的恶劣、亲朋好友的离散、精神世界的痛苦,让他穷困潦倒、苦不堪言。但是,再艰苦的环境也没有摧毁他的意志和理想,他始终未曾丢掉自己的气节与志向,放逐山水,写诗著文,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学风格,终成大家。

柳宗元将谪居时生活的磨难转化为艺术的享受,将生活的痛感转化为艺术的美感,给后人留下美妙的诗句、美好的文章。即便是孤舟,也要登舟而行;即便是寒冷的江面上锁着白茫茫的大雪,也要垂钓;即便什么也钓不着,也要拿出气势来,那是一颗孤零零的心面对困境时生长的力量。

《江雪》的孤绝、《小石潭记》的清丽、《蝟蠻传》《黔之驴》的深刻寓意,都让我们深深地记住了这位文学家、思想家的名字。他和韩愈、刘禹锡的真挚友谊让人感慨,特别是他不顾政治风险为同样被贬谪的刘禹锡说话,愿意自己多吃一点苦来换得刘禹锡少一点苦,这种“士穷乃见节义”的高洁人格为人感动与赞叹。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屡屡给予高度评价。

柳宗元在柳州期间,任刺史,官职并不大。唐朝法律禁止买卖人口,但柳州地理位置偏僻,又贫穷,人口买卖屡禁不止,劫持小孩的现象时有发生。柳宗元果断采取措施,有效杜绝了买卖人口。为此,他写了一篇《童区寄传》,既表现了政治家的正义感,也是文学家对社会的独立贡献。

今天,我们重读柳宗元,不仅仅是审美享受,也可从中学习他困境中不服输的精神,以及对人、对事的真诚与高洁的品质。



《江雪》绘图(资料图)

寒江独钓意境远

边云芳

愿他们在文字中永生

——长篇纪实文学《共赴国难》创作谈

林小静

写完《共赴国难》(山西人民出版社2025年4月出版)这本书的时候,是个秋日,窗外几株大树上的落叶,正随着秋风,深情地扑向大地。

那一片片落叶,让我联想起书中一个个模糊而又清晰的背影。他们曾经是那么年轻、那么坚决、那么勇敢。即便已经过去了80多年,至今回想,他们的背影依旧是那么高大、动人。

轻轻合上书稿的那一刻,我的脑海里不由地冒出了一句话:愿他们在文字中永生。

永生的,不是生命,而是精神。

我的思绪回到6年前。那一年,我去太原机务段的一位退休老同志家采访,老人名叫高国柱,上世纪50年代,他和工友曾告别人家,从太原出发,去内蒙古支援集二铁路建设,我要采访的内容,正是那段往事。

老人已90多岁,但思维敏捷,也很健谈。在交谈中,他除了给我讲述他和工友去集二铁路、在赛汗塔拉机务段工作的经历,还给我讲了抗日战争时期他和工友如何运送八路军将士到平型关和娘子关战场,以及山西沦陷后,他们又是如何破袭铁路、传递情报的故事。我当时没有关注他讲的这段历史,因为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在史料中看到过山西铁路工人参与抗战的记录。

后来,一位在长治从事文史资料整理的老师拿着公函找到我所在的太原铁路局,希望能调阅几位已经去世的老同志的档案。我当时恰巧在档案室,看到他纸上列出的一串串名单,就好奇地问他调阅这些老同志的档案做什么?他说名单上的这些铁路工人,抗战期间都曾在长治一带的铁路从事地下工作,给太岳、太行两大革命根据地提供了许多情报,送去了许多物资,有的同志还因此惨遭敌人杀害。长治武乡的南关火车站,就有不少工人参与了侦察和情报传递,并配合八路军部队一次次袭击火车站,而被敌人抓捕、杀害。

众所周知,长治武乡当时是八路军总部长期驻扎地,在那片土地上,曾发生过许多著名的战斗和战役,因此听了那位老师的话后,我很是吃惊,原来山西铁路工人当年真的参与了抗战,并作出了巨大牺牲。于是我抓紧时间又去找高国柱老人,想让他给我详细讲讲当时的情况,遗憾的是,高国柱老人已经去世,而且经过了解,当年与他一起参与抗战的同事,也都已经去世。我心里很后悔,甚至自责,为什么当时没有关注到老人讲的这段抗战经历,他和他的同事当年是怎么把八路军送到前线的,又是如何破袭敌人铁路、炸毁敌人列车、传递情报的?除了南关火车站的工人,还有哪些工人也牺牲在了敌人的枪口下?

我想解开这一个个谜团,因为这些谜团背后,是铁路工人崇高的追求与信仰。于是我先去了趟武乡,来到当地政府在南关火车站遗址附近建起的一座英烈碑前。碑上,刻着当年惨遭敌人杀害的先辈的名字。

昌源河哗哗地流淌,不远处废弃的铁路大桥上,炮弹留下的弹孔清晰可见。那是80多年前武乡军民抗击日军的见证,而守护破碎山河、奋勇反抗侵略者的人群中,就有铁路工人的身影。



我在路边的草丛中,采了一大捧野菊花,恭敬地放在英烈碑前,然后久久沉思。

一阵微风吹过,旁边的树木和庄稼沙沙作响,像是在低语什么。我在这沙沙声中思考一个问题:我能为他们,以及那些远去的前辈做点什么?

答案,很快便有了。因为唯有文字,可以让曾经年轻的、坚决的、勇敢的他们重回我们的视线中,可以让我们和他们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交流。

回来后,我有针对性地查阅了一些老同志的档案,购买了八路军三大主力部队抗战纪实的系列书籍,又到山西省委党史研究院查阅了大量史料,并在老人一辈子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回忆录中寻找线索,同时走访了一些老同志的后人。

线索,越来越多。在一些资料中,我看到铁路工人为了阻止敌人的侵略步伐,被迫炸毁自己亲手修建的铁路大桥时的情景:“铁路工人以铁路为生命,对轨道、桥梁及各种建筑物,爱护备至,一旦自行实施爆破,或相对无言,或竟抱头而哭,其悲痛之情,非言辞所可形容。”也看到他们在前无去路、后有追兵的情况下,怀着悲愤之情,将抢救和转移到黄河岸边的机车、车辆以及铁路器材投入滚滚黄河中的记录。看到他们在平型关战役中运送八路军部队的身影。同时,还看到他们在百团大战中配合八路军破袭铁路的文字记载。甚至在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一篇日记中也看到了铁路工人的身影。

铁路工人的英勇往事,渐渐清晰起来,在这个基础上,我开始进行创作。虽然这样的创作十分辛苦,但却是值得的。我想用这本书,告慰那些在国难当头之际,挺身而出的铁路前辈。他们,是我们永远的榜样。

愿他们在文字中永生。

位作家的写作真功夫! 书写和刻画人物,虚笔运用乖巧,闲笔不闲,见功夫! 可以看出,写者与被写者,都是大家! 用文字说话,这就是实力!

网友“侯青山”留言:

向开宗立派的伟大作家赵树理致以崇高的敬礼!

读者之声

4月24日,本版刊发由葛水平撰写的《赵树理永远是一个高度》,该文在太原日报社“锦绣文丛”公众号上发布后,反响热烈,网友踊跃留言,表达感想。

网友“国王”留言:

为赵树理一颗文艺之星升起在太行山、升起在抗日根据地而自豪。《小二黑结婚》深入人心,我们中国文坛上,有了一位崭新的人民作家,有了一种崭新的文风。传承历史文化! 建设文化强国!

网友“山河远阔”留言:

隐隐写出了命运和时代性! 翩翩数笔,见两

花蕾枝枝似去年

——评刘小云散文

作家勤于笔耕,年龄渐老而依旧多产,这是好事,但如果不顾思想随年老而业已僵化的现实,逞强好胜,一旦滑入为文造情的泥淖,则不一定是好事了。我国南朝时的文学理论家刘勰,就在他的传世大著《文心雕龙》中,指出了文章的两种作法,那就是“为情造文”和“为文造情”。为情造文,强调文章要基于真实的感受和感情,有感而动笔,情感主导文字,文章才能真,作品才能美,这是一种理想的文学创作方式。反之,为文造情则违背了文

章的写作规律。它靠生造情感,强行拼凑文字,这类文章有时貌似高大上,实则拿腔拿调,无法引起读者兴趣,无法产生共鸣。

近日,刘小云又整理出一部书稿,是2013年到2024年在微信上写下的微语短章。有的曾发于好友,有的则发在朋友圈。她告诉我,整理这些微语的初衷,是来回翻看历年生命履痕,回味曾感动过自己的生活。电话那头,她爽朗地问我:“写作也是一种养老模式吧?”我应声而答:“当然是!”

关于写作养老,在退休的老年人群中,是一个并不新鲜的话题。在我重新触摸这个话题前,不妨与大家共赏刘小云信手写于2018年12月11日的一则短章:“年入七旬,我虽然已经出了几本散文集,但是,还是管不住思绪的流动,随时会有激情涌动,随时会有文字记写下来。我也会常常翻看我的散文集,发现,每一篇散文都留有我的人生印记……回过头来看,啊! 人生之印,是我生命的图谱,像一条潺潺流动、间或也有急流的小河,当我完成人生旅途时,这些散文会汇入我生命的大海。这大海的灵魂,是纯洁和神圣的。”

不难看出,这些朴实的文字,是刘小云的情感引领着思绪,思绪又化成了文章。这些文字如泉水在山涧中欢乐地流淌,让人神清气爽,顿感血脉通畅。刘小云曾写道:“写作是一种生活状态,激情产生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之中。”这样的脑力运动,自然会让写作者用激情滋润心灵,达到健体养生的功效。

然而,不是所有的写作者,都会在写作过程中带来这种健体养生的功效。善与美的基础是真,那种刻意奉迎,为某种目的去涂脂抹粉、去堆积文字的脑力运动,因其情感上的一个假想,便难以掩饰其丑与恶的质地,即便成文,也难以归类于文学创作。那种矫揉造作的写作,可以填充起退休时光,但对写作者心灵的修炼、提升和养护,恐怕就谈不上了。

浏览刘小云近十年间写下的这些微信短语时,读者会感觉到这就是一位老作家近十年生活的一部纪实作品。刘小云已然化成了“我”这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我”一头银发,面带笑容,正浸泡在晚年的幸福生活中,愉快地忙碌着,幸福地写作着,与儿孙们打闹着时光,陪老伴唠叨着以往,与文朋诗友同道聚会,和微信粉丝隔屏闲聊……“我”的思绪,有时辽阔如大海星空,有时缜密似细雨斜风。没有高谈阔论,没有套话空话,感悟着平凡的岁月,记载下亲情和友谊。那些刚刚退休,自得也会写字作文、却尚未跳出“为文造情”窠臼的老年朋友们,若想写作养老,不妨读读刘小云女士的这些微语短章,定会受到启发。

有这样两句唐诗,我以前曾用来激励自己,现在用来赠给刘小云。它的作者薛沵,在群星璀璨的唐代诗坛,只有这两句诗流传了下来,冠名《句》,列入《全唐诗》中。诗曰:

也知别有风光主,花蕾枝枝似去年。

我和刘小云是太原三中的老同学。我们这批同学中,后来成长为作家的,还有张石山。张石山同学早在1980年和1986年,就以短篇小说《颤柄韩宝山》和《甜苣儿》两次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我称他为当代文坛夺魁者,而把我自己和刘小云同学,视为当代文坛随跑者,没有因文思枯竭而无奈地被淘汰出局,作品还能经受住历史的淘洗,入选文坛权威的选本。眼下,虽进入人生暮年,依然能不停地涌现出真实的情感,笔耕着思维的沃土,时有新作问世,这大约是我们这些文坛随跑者的共同特色。